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 1978—2011

——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莫艳清 杨建华

提要：基于 2011 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关键词： 市场转型 社会流动 地位获致 “精英再生产” 内在机制

作者莫艳清，女，1984 年生，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建华，男，1956 年生，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杭州 310025）

一、引言

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思想最早可上溯到索罗金 (P. A. Sorokin) 的《社会流动》(1927)，其社会流动率与社会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为社会流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性地位。二战后，国际上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形成了 50 年代以利普塞特 (S. M. Lipset) 和本迪克斯 (R. Bendix) 发明和应用职业流动表进行流动率分析为标志的第一代流动研究、60 年代以布劳 (P. M. Blau) 和邓肯 (O. D. Duncan) 将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相结合并将路径分析技术引入地位获致研究为标志的第二代流动研究以及 70 年代以流动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 (对数线性模型、离散风险模

型) 和关注精英群体研究为标志的第三代流动研究等三个典型的研究阶段。由此，学术界基本上从流动率、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群体的形成与选择三个角度来考察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状态和变迁方向，以判断社会系统的开放或封闭程度。

国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从对大城市 (如山东、天津、深圳) 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内数据的研究，吴忠明、严善平和陆学艺通过流动表的分析得出结论：我国社会流动率在改革前后差别明显，流动率不断提高，社会系统日趋开放，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现象。白威廉 (William Parish) 通过对大陆 1972—1978 年间迁居香港的 132 位移民的访谈和他们 2865 位邻居数据的研究是最早对我国社会成员地位获致的研究，得出父母对子女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的提高无

所助益的结论;^①而林南和边燕杰于1985年在天津的调查得出与白氏相反的结论。^②此后,李路路和陆学艺等人的研究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林与边结论的正确性,还分别得出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和父母对子女地位获致的影响已由依赖不平等的制度性因素(如分割市场中的单位部门等)转变为对教育路径依赖的结论。^③当然,对精英群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有魏昂德的“精英二元职业路径论”、泽林尼“精英分化理论”和郑辉和李路路“精英排他与代际转化”的三大经典理论,并有边燕杰等人和臧小伟针对魏昂德和泽林尼的研究结论提出的不同观点与看法。

虽然我国社会流动的研究领域日益拓展、研究技术不断更新以及研究成果也日趋丰硕,但从总体看,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是放在建国以来至今的笼统的大时段研究或者进行改革前后两个时段的比较研究,而缺乏对社会发展变化迅速与剧烈的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全面与细致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改革开放30余年来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来详细了解我国社会流动总体状态、流动方向以及内在机制,以考察我国这一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系统是否真正逐步趋向开放,因为自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从再分配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经济不断收缩,市场经济不断扩张,政治体制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变化较快。基于上述目的,本次研究主要利用“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调查”的1042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从流动率、地位获致模型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机制模型三个方面着手,以详细深入了解这一时段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为了检视各个同期群的代际间社会地位流动差异,也了解社会系统的开度是否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而不断提高,本研究以受访者入职年代为基准,将研究时段设计为以下几个具有显著特色的时期:(1)1978—1991年的改革开放初期,以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为标志界限;(2)1992—2000年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的时期,以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性界限;(3)2001—2011年的全面向国际社会开放时期,以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性界限。

二、理论与假设

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世人瞩目的巨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我国从再分配经济形态走向市场经济形态。美国学者维克多·尼(Victor. Nee)将这种转变称之为市场转型,并在80年代末提出“市场转型论”,随之引发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实际上,市场转型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必然引发社会分层体系的规律性变化,而分层体系的变化则必然改变社会流动的规则。在不同的经济状态下,尤其在当前中国的混合经济阶段,各种因素(市场的、政治的、地方的)对社会的整体流动方式和规则发生着不同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地位获致模型和“精英阶层再生产”模型的理论性假设。

1. “工业化”假设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因素在个人社会地位获致过程中的作用将会愈发突出,反之,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布劳与邓肯的“工业化—功能主义”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社会流动率将不断增长,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流动的规则将从家庭出身(继承机制)转变为自致成就(自制机制)。^④

2. “市场化”假设

(1)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资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个人地位获致的作用将越来越弱,而受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则将变得越来越强。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将导致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具体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受益增加、政治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和新的机会结构的出现等。同时,市场

^① See Parish William, L.,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0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 by J. L. Wa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4—120(1984).

^② 参见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5—118页。

^③ 参见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05—118页;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0—201页。亦参见于张翼:《中国人的社会地位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76—90页。

^④ See P. M. Blau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17—128 (1967).

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① (2)在中国渐进转型的市场改革中,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一个人的初职地位越高,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彼得·多林格和迈克尔·皮奥雷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和单位部门之间的代内流动是有限的,一个从“坏”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就业的人由于培训和提升机会少,很难进入“好”的市场。一开始就进入好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肯定比进入次的劳动力市场人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②

3. “制度分割性因素影响弱化”假设

(1)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不断的完善,单位部门性质作为个人社会地位获致高低的影响因素仍然发生明显作用,但是不断趋向弱化。体制内部门与体制外部门由于拥有资源的多寡差异,因此地位资源含量也有所差异,往往是体制内部门比体制外部门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再分配体制正在萎缩,市场因素不断扩张,单位部门性质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趋向弱化。(2)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影响在逐渐降低,户籍性质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方面影响的差异在日趋淡化。城乡壁垒的制度设置(户口制度),长期以来都影响着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但市场的崛起,国家对教育的日益重视和公共教育资源的不断重组,户籍壁垒对教育和就业所产生的差异在不断缩小。^③

4. “精英阶层再生产”假设

(1)在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遵循“精英再生产”的逻辑,非精英群体的子代与精英群体的子代成为精英的几率存在显著差别,前者的几率明显小于后者。在当前资源优势可以互换的规则下,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代表的社会强势阶层内部相互交换资源而结成“精英联盟”,“精英联盟”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和精英群体代际转化来实现精英阶层再生产。^④ (2)在市场转型时期,在各种资源能够实现代际传递和相互转换的情况下,各种精英群体不仅能实现“阶层内部再生产”,而且还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马奇和韦索罗斯奇的社会资源代际传递论

认为,社会代际传承主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种资源在代际间的传递,他们通过物理传递或者教育(家庭和学校)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有效传递,从而实现精英阶层内部再生产。^⑤ (3)作为抓住市场机会而产生的新兴精英群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选拔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党员资格和教育程度对成为经济精英的影响不如后两者。私有部门在前国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出现和随后的壮大是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市场部门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机会,私营企业家等经济精英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沿着官僚等级发展之外的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但是在这样不同的机会结构下,城市和农村中的自雇佣者在个人背景方面是有差异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经济精英与其他精英的选拔机制也是有差异的。^⑥

三、阶层地位流动的的总体状况与特征

代际流动主要研究父辈与子辈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继承与变动,探询父辈对子辈地位达致的作用,因而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的过程与方向,代际流动率的高低也能反映社会系统的开放或者封闭程度。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职业地位流动源于职业结构自身变迁和社会系统开放性的共同作用,因此,社会流动率成为社会系统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

表1 父辈与子辈之间地位总流动率表

流动类型	总体百分率	1978—1991	1992—2000	2001—2011
总流动率	79.3	75.9	82.1	81.8
不流动率	20.7	24.1	17.9	18.2
上升流动率	60.6	59.3	64.5	58.9
下降流动率	18.7	16.6	17.6	22.9
结构流动率	40.1	44.2	45.7	42.0
纯流动率	39.2	31.7	36.4	39.8
上升流动率与下降流动率之比	3.2	3.6	3.7	2.6
	N=1028	N=457	N=279	N=292

① 参见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196—202页。

② 参见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

③ 参见边燕杰等:《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05页。

④ 参见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74—86页。

⑤ Bogdan W. Mach and Włodzimierz Włosowski: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Ractedge and Kegan Paul, 1982:78—79.

⑥ 参见吴晓刚:《干部和市场机会:中国进入自雇职业的模式(1978—1996)》,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2—283页。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流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社会总流动率高。从总体流动率(79.3%)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总体开放度较高,五个人中间就有四个人实现了代际间的流动,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经济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推动和社会流动渠道的逐步开通。同时,3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的总体流动率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75.9% $<$ 82.1% $<$ 81.6%),说明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日趋提高,社会活力显著增强。

二是结构流动率高于纯流动率(40.1% $>$ 39.2%),但纯流动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31.7% $<$ 36.4% $<$ 39.8%)。结构流动率高说明与经济发展(以GDP为测量标准)正向关联的职业数量增加和职业层次提升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了流动机会和上升流动的空间;3个不同年代入职群体纯流动率的不断攀升说明,年龄越大的从业者与父辈职业阶层背离受职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越大,而年龄越小者背离父亲职业阶层则受社会开放程度的影响越大;纯流动率的不断上升还说明,由于新的制度和政策逐渐消解了原有政策的阻断作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开始直接推动着就业空间的扩张和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流动渠道不断拓宽和愈发畅通,能力自主原则在地位流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三是上升流动率大大高于下降流动率(60.6% $>$ 18.7%),且在各个同期群之比均达到了2.6倍以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艺手段的引进创造出大量新的职业类型和社会位置,同时也导致大量传统职业位置的减少。由于减少的职业处于等级制的底层并有较高的流动性,而增加的职业则接近于等级制的顶部并有较低的流动性,这一底部供应的推力和顶部需求的拉力为大多数出身于各类家庭的人创造出各种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创造出一种促使人们向上流动的推力,整个社会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这符合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不同时段入职群体的数据分析显示,上升流动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下降

流动率不断上升,且上升流动率与下降流动率之比从3.6降至2.6。根据泽林尼的“市场渗透类型论”,在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初期(即再分配经济中的市场),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即以市场和在分配共存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平等机制。^①更为重要的是,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制被叠加在一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方面的显著差距,从而阻碍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与空间。^②用孙立平先生话说,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③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有向精英联盟发展的趋势,上层社会垄断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阻断了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渠道,从而导致上升流动率有下降的趋势。

四、地位获致的内在选择机制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整体上受制于个人层面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但从个体的角度看,社会流动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对这些结构与制度的能动取益结果。社会学认为,导致每一个社会个体或群体享有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原因,除了宏观的结构—制度因素的影响外,还有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运作这些资源的能力与效果。资源拥有和运作能力因人而异,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也就不尽相同。

(一)初始职业地位获致的内在选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初始职业地位的取得主要由哪些因素决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这些决定因素影响的大小是否随之发生改变,毕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有着不同的规制路径。表2详细地报告了这种因为时段不同而发生的变化:

^① 参见泽林尼,科斯泰罗:《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走向综合?》,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580—586页。

^② 参见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会》2008年第3期,第25—26页。

^③ 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期,第100—101页。

表2 初始职业地位决定因素(模型1)

自变量 \ 标准回归系数	全样本	1978—1991年 模型 1.1	1992—2000年 模型 1.2	2001—2011年 模型 1.3
父亲职业地位	0.168***	0.237***	0.106*	0.077*
父亲受教育程度(序列变量)	-0.027	-0.051	-0.025	0.034
父亲单位性质(体制内=1)	-0.102	-0.192	0.021	0.035
本人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中专	0.267***	0.187***	0.233**	0.103
大专/本科	0.411***	0.354***	0.396***	0.400***
研究生及以上	0.135***	0.280***	0.250***	0.328***
初职单位性质(体制内=1)	0.241***	0.226***	0.221*	0.078
户口(非农=1)	0.029	0.010	-0.051	0.064
年龄(控制变量)	0.036	0.103*	0.077	0.260
性别(男=1)	0.002*	0.127*	0.154*	0.143
adR ²	0.350	0.369	0.330	0.280
N	1005	446	273	286

注:*** < 0.001、** < 0.01、* < 0.05 显著性有意义

第一,在1978—1991年、1992—2000年和2001—2011年三个历史时段,父亲职业地位始终都对子代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这主要因为在我国这样的政权等级和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职业地位高的父亲往往能够拥有更多资源与关系为子女谋得一份较好的岗位。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加快,父亲的职业地位虽然对子女初职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明确的影响力,但还显示着这样的趋势,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来自于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就愈小,这与我们之前的假设一致。

第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段,教育程度都对个人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强烈的影响,这表明社会成员靠个人后天努力获得较高职业地位的流动机制真正确立,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愈来愈高。从模型报告系数可以看出,大专/本科学历对个人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更强的影响,且随着体制转型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学历表现出的影响也越发强烈。而高中/职高/中专的这一学历在2001年之前对个人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表现出强烈的影响,但在之后,高中/职工/中专这一学历比其他学历相比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相对发达阶段,社会职业对人们的学历文凭要求越来越高的缘故。

第三,初职单位性质对人们初始职业地位获致在前两个时段表现出了显著性影响,但在2001—2011年这个时段,初职单位性质却未表现出显著性影响。在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还是以再分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市场发展是以地方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单位性质对人们地位的影响具有明确显著性。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就业单位部门所占比例缩小,而大量的高等职业(如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等)在体制外部门产生,即使人们没有进入较好的体制内单位,照样能够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第四,从户籍和性别来看,两者均未对人们初始职业地位的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放弃了身份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例如,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社会成员可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尤其是随着我国成为加工贸易国后,农民工成为我国加工制造业发展的生力军与主力军,因此,户籍性质对人们初职地位获致未能产生影响。而性别未产生影响,说明在劳动力市场进入的职业选择过程中,对女性未存在明显的歧视,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获得高的职业地位。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发育程度的加深,在个人初始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来自家庭背景的影响因素虽然表现出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在日渐式微,而个人受教育程度等后天性因素却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影响,这与劳动力市场化发展带来社会系统开放度的提高紧密相关。

(二)现职地位获致的内在选择机制

在职业生涯中,人们的初职地位、受教育程度、父

亲的职业地位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单位部门性质这一影响因素等,对本人现职地位获得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分析现职地位获致的模型,都不能缺少这几项变量。但是,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不同调查取样背景下,增加或减少某些变量就会对模型确定系数的变化具有

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现职地位获致模型中,我们除了使用了初始职业地位获致的自变量以外,还加入了初职地位、现职单位性质和党籍等变项。综合分析模型,可以发现:

表3 现职地位获得决定因素(模型2)

自变量 \ 标准回归系数	全样本	1978—1991年 模型 2.1	1992—2000年 模型 2.2	2001—2011年 模型 2.3
父亲职业地位	0.055*	0.059**	0.219**	0.103*
父亲受教育程度(序列变量)	0.067	0.016	0.147	0.111
父亲单位性质(体制内=1)	0.003	-0.072	0.006	0.120
本人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				
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职高/中专	0.081*	0.177***	0.045*	0.029
大专/本科	0.076**	0.137*	0.027***	0.033**
研究生及以上	0.039*	0.079*	0.111*	0.037**
本人初职地位	0.426***	0.371***	0.507***	0.517***
初职单位性质(体制内=1)	-0.022	0.025	0.021	-0.226*
现职单位性质(体制内=1)	0.130***	0.196**	0.020*	0.241
户籍(非农=1)	0.030	0.001	-0.034	0.121
党籍(中共党员=1)	0.143***	0.110***	0.054**	0.021**
年龄(控制变量)	0.049	-0.092	0.067	-0.012
性别(男=1)	0.071*	0.052	-0.023	0.140*
adR ²	0.442	0.430	0.541	0.492
N	1001	445	271	285

注:*** < 0.001、** < 0.01、* < 0.05 显著性有意义

第一,父亲的职业地位这一先赋性因素对各个时段入职的人们来说都具有正面的显著性影响。模型报告数据显示,在1978—1991年这个时段参加工作的同期群来说,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他们的现职地位获致具有一定影响,但比较微弱,可能的原因是早期时段参加工作的人,由于其现在年龄偏大且相对处于社会的较高层,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现在的位置,这或许说明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初职进入或者早期工作阶段来发生的,对其现在影响比较微弱。对于1992—2000年和2001—2011年这两个时段入职的群体来说,现在职业地位获致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说明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是在子女就业的早期或者是中期,这与前面推断一致。

第二,本人的初职地位对个人现职社会地位的获得在各个历史时段都具有强烈而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的初始职业地位越高,现职地位

也随之增高,当然这也可能与入职时间有关,越晚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其初职与现职之间距离越短。当然中国的再分配经济存在部门分割的结构壁垒,市场经济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壁垒。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开放的体系,有垄断经济和非垄断经济两个分割的结构。垄断经济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作契约受制度保护,年资效应强,工团力量大,报酬及福利稳定且较高,非垄断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外部的,没有上述优势和结果。因此,初职进入了职业地位较高的市场经济中的垄断部门或者是进入了再分配经济中的体制内部门,无疑有了更高的就业与发展平台,那么对个体的职业地位攀升具有良好的基础与上升通道。

第三,对各个不同时段入职的群体来说,现职单位部门对其职业地位获致的影响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对改革初期就职的群体来说,获得的较高职业地位基本上是属于体制内单位,而新兴的高职业地位基本上是

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现职单位性质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对市场经济确立时期入职的群体来说,现职单位性质对其具有一定影响,但不如高年龄段的人影响那么大;对于入世之后就职的群体来说,现职单位部门对其职业地位高低未有明显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这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同期群,主要是在体制外单位工作,其获得的高职位也是属于体制外较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内的高职位主要是由早期参加工作的人占据,另一方面也是体制内部门在不断减少,而体制外部门在不断增加,大量的高端职位在体制外部门产生。

第四,本人受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是两个极其显著地决定个人现职地位获致的影响变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年龄段的同期群,虽然党员身份仍然显示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同时,在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政策的影响下,那些是党员而又有知识的人就易于得到提拔,教育资本开始显示出其更加重要的影响力,我们的统计模型也显示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才通过各种培训渠道,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工作后不得不到教育再生产的学校去重新充电。这表现出在1992年之后,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教育资本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权重进一步加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技术升级中更易于升迁到较高的工作岗位。因而,受教育程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因素。

五、精英阶层地位继承与选拔机制

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趋势是:政治精英^①、

经济精英^②和文化精英^③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越趋明显和固化,中国社会力量的重组并不是向中产阶级社会迈进,而是不断走向两极社会。^④对此,郑辉和李路路则从精英阶层代际转化和再生产的角度来解释,他们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国家自上而下渐进改良式变革的制度背景下,精英阶层之间通过代际转化和排他机制实现精英阶层再生产。^⑤之前,大家对精英群体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干部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技术精英)之间关系及其获取路径的研究,未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新兴群体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之间的关系及其获取路径的研究。因此,本文在这里对其进行模型数据统计与分析,该模型数据报告显示:

第一,三大精英阶层的代际继承性均比较明显,尤其是父亲是经济精英的子代成为经济精英的概率居然高达19.4倍,父亲是政治精英的子代成为政治精英的概率也是其它群体的3.7倍,父亲是文化精英的子代成为文化精英的概率也高达5.5倍,这说明精英阶层具有强烈的“阶层内部再生产”功能。

第二,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并未形成紧密的代际间相互转化与排斥非精英群体的联盟集团,但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代际相互转化非常明显。父亲是政治精英的子代相比于其他群体成为文化精英的概率达到2.2倍,而文化精英的子代相比于其他群体成为政治精英的概率也有1.3倍。经济精英则独立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外,它并没有与其他两个精英群体之间形成代际相互转化的关系,而是实行阶层内部再生产,这可能是跟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有关。

表4 精英阶层地位继承与选拔机制^⑥(模型3)

自变量	发生比率	模型 3.1	模型 3.2	模型 3.3
		政治精英/非精英	经济精英/非精英	文化精英/非精英
父亲是政治精英(精英=1)		3.743**	1.032	2.235*
父亲是经济精英(非精英=0)		1.344	19.435***	1.978
父亲是文化精英		1.322*	2.435	5.495***
本人受教育程度(序列变量)		4.496***	0.645	5.715***
党籍(中共党员=1)		9.341***	1.499	1.315***

① 政治精英,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具有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以及人事权力的群体。

② 经济精英,拥有相当经济资本的群体,他们主要通过市场方式进行生产和交易来维持的行业精英。

③ 文化精英,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具有高等学历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阶层。

④ 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⑤ 参见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67—69页。

⑥ 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选拔机制主要是通过代际流动讨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者之间的关系。父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找到第一份工作时父亲的职业阶层来划分的,子代的精英类型是根据子代在调查时点的职业(现职)阶层来划分的。

性别(男=1)	1.969*	1.732	1.884
年龄(控制变量)	1.056**	1.024	4.577*
Cox&Snell R square	0.188	0.232	0.248
Nagelkerke R square	0.488	0.456	0.468

注:*** < 0.001、** < 0.01、* < 0.05 显著性有意义

第三,在精英群体的选拔路径中,受教育程度对成为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具有非常明确的影响,这说明我国的干部精英向知识化方向发展,这或许也正如魏昂德、泽林尼所说的知识分子走向了阶级权力之路,^①只不过在中国渐进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形成路径是通过代际转化实现的。党员对成为政治精英的概率比非党员高达 9.3 倍,这说明了政治忠诚度仍然是成为政治精英的先决条件,与受教育程度一起,政治精英正向臧小伟所说的“既红又专”方向发展。^②但与魏昂德“职业二元路径论”不同的是,党员对成为文化精英也具有一定的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大部分文化精英在体制内单位就业,因此党员身份依然对其有正向的积极作用。

第四,对经济精英的形成路径而言,受教育程度和党籍均对其职业地位的获得未发生明确的显著性影响。这可能的解释是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粗放的外贸加工为其主要支柱产业,他们的形成与其早期的市场机会获得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而学历并未其多大作用,尤其是浙江的经济精英主要遵循子承父业的逻辑,学历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显著性影响。这样,对于党员身份不发生作用的解释也就清楚了,因为浙江省的经济精英几乎都是体制外单位,很少存在体制内单位。

六、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社会总体流动率高,呈整体向上流动的趋势,社会系统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2)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先赋性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致影

响越来越弱,后致性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致影响呈现出愈发强烈的趋势,这符合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一般规律;(3)中国特色的单位性质部门这一变量对个人职业地位获致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不断消弱,党员这一身份变量在个人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虽然表现出明确的显著性影响,但正如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所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资本在经济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弱;(4)当前,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通过阶层继承和代际转化而实现了精英阶层再生产,而经济精英则通过自身阶层内部的继承而实现再生产,三者之间并未通过代际相互转化而形成代际间的精英联盟。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计划经济所塑造的社会结构被逐步打破,也开始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向体制内单位流动的局面,在体制外开辟了新的流动渠道,使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个人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受教育程度起着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所以,要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就必须在制度上保证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基础教育,并能比较容易地接受高等教育。没有教育机会的相对平等,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国家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

责任编辑:张 平

^① 参见魏昂德:《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精英生成的二元职业路径(1949—1996)》,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5—199页;See Szelenyi, Ivan & Eric Kostello,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1996).

^② 参见臧小伟:《大学文凭和中共党龄在政治精英选拔中的作用》,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4—278页。